

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考古年代学的审视

常经宇

陕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集中在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这个阶段是该地区文明演进的重要节点,不仅诞生了以石城聚落为标志的文明形态,更形成了以石峁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格局,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区域。然而,相较于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生业经济等热点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进而限制了对考古学文化性质和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理解,而这些问题正是探索陕北乃至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因此,本文旨在重新梳理和分析陕北地区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并将其与周边区域典型遗址的测年成果进行对比,重新审视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

仰韶时代晚期

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相对较少。从考古学文化因素看,伴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瓦解,中原地区对陕北地区的文化支配地位明显减弱,陕北地区文化因素的来源趋于多元化。南部地区继续与汾渭平原保持密切的联系,邸楠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五庄果壤类型。北部地区虽然存在喇叭口尖底瓶,但是小口双耳壶和丰富的彩陶因素,却反映出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的强烈影响。

陕北地区本阶段仅有横山杨界沙和横山大古界遗址开展了测年工作,由于两处遗址均为晚段遗存,年代上限还需要在周边区域寻找线索。包头阿善和包头西园遗址的测年工作开展较早,年代范围集中在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00年,由于两处遗址包含早段遗存,因此部分学者将本阶段的年代上限定为公元前3800年或公元前3500年。从许永杰和韩建业的陶器分期可见,阿善遗址T9④、西园遗址F5的相对年代较早,但是测年数据却非常晚,并且年代区间非常大,可见部分测年数据存在很大问题,年代上限还需要在仰韶中期的年代下限中寻找证据。

离石德岗遗址是河套地区仰韶时代中期的典型聚落,高精度测年范围集中在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900年。由于德岗遗址出土的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曲腹盆等具有典型的晚段特征,因此其年代下限具有代表性。近年来,灵宝西坡、高陵杨官寨等遗址的测年数据引发了学界对仰韶中期年代下线的思考,部分学者提出公元前2900年应是庙底沟类型的结束时间。由于退化重唇口在陕北乃至河套地区多有发现,德岗遗址的测年数据又与汾渭平原的测年成果完全吻合,因此公元前2900年左右应是陕北乃至河套地区仰韶中期的年代下限,同时也为仰韶时代晚期的年代上限提供了佐证。

横山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是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典型聚落,高精度测年范围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700年(图1)。由于两处遗址出土的喇叭口尖底瓶、鼓腹罐、深腹罐等具有典型的晚段特征,因此其年代下限具有代表性。庆阳南佐、垣曲上亳遗址是陇东和晋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典型聚落,其中晚段遗存的年代下限集中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与横山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基本一致,因此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年代下限可定为公元前2700年,持续时间仅有公元前200年左右。

南岛语族研究的平潭模式——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思考

林颖 陈盛 范学赞

11月30日,由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作为召集单位,联合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和机构,在平潭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南岛语族与海洋文明专业委员会,并将秘书处设在平潭。

这一举措标志着“考古中国——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课题研究实现了从学术探索到实践合作的重大跨越。该委员会作为政府间文化遗产交流的国际组织,为课题未来在更广阔的太平洋区域开展联合考古调查、学术交流与科技考古合作,提供了制度化的高端平台。将学术研究所揭示的文化遗产价值,转化为区域协同保护的具体行动,实现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使“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学术叙事,成为连接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增进文化理解与民间友好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的“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课题取得显著进展。福建平潭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与太平洋考古的结合点,凭借其特殊地理位置和鲜明的海洋文化特性,已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核心区域。近五年来,平潭通过深入发掘研究南岛语族文化,依托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及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为平台,开展创新实践工作,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公共考古实践路径,为中国特色考古学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学术基础:构建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序列

自2021年“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平潭综合实验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等10余家科研机构,对壳丘头、西营、龟山、东花丘等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构建起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年至距今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框架。西营遗址发现的多处墓葬和人骨遗骸,填补了闽台前人类遗存空白;龟山遗址揭示的祭祀台基、房址等遗迹,深化了对东南沿海史前社会结构的认知。通过陶器残留物分析、古DNA研究、古环境重建等科技考古手段,显著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

平台建设:从研究基地到国际组织

平潭构建了多平台、高维度的宣传矩阵,确保考古成果实现全方位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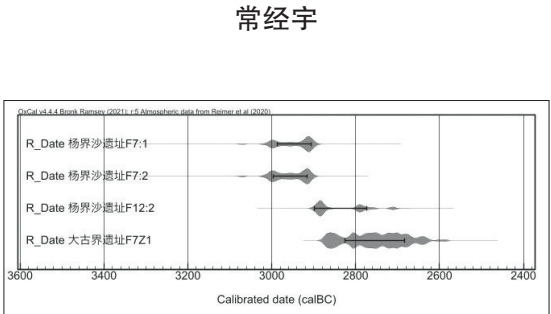


图1 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碳十四年代峰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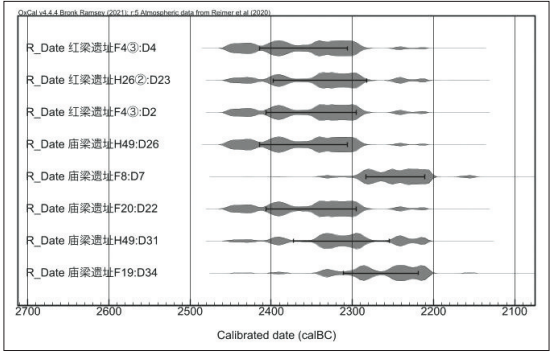


图2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碳十四年代峰值图

龙山时代早期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考古材料相对丰富。与周边区域“龙山化”的文化态势一样,陕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南部地区继续受汾渭平原的强烈影响,盆形罍、单把罐、石厨刀等器型与陶寺早期遗存非常相似,应是后者影响的结果。北部地区虽然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间接影响,但是饰横篮纹的“乳凸”状尖底瓶、直壁缸、折腹盆等器型已经属于阿善文化的范畴。

陕北地区近年来在延安芦山峁、靖边庙梁和横山红梁遗址开展了高精度测年工作,由于三处遗址均为晚段遗存,年代上限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寻找线索。若以罍作为龙山时代早期的标志,陕北地区的年代上限要晚于汾渭平原。如果考虑遗址发现的偶然性,则不能排除陕北地区也有早期罍的可能性,故年代上限与汾渭平原大致相当或略晚。尖底瓶本阶段在汾渭地区已经普遍消失,但是陕北地区还继续了延续尖底瓶的演变序列,出现了标志性的“乳凸”状尖底瓶,该类器型应当作为陕北地区进入龙山时代早期的标志因素之一,因此年代上限应与仰韶时代晚期衔接。横山杨界沙和大古界遗址是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高精度测年,并且得到了周边地区年代数据的佐证,因此公元前2700年的年代下限相对准确。此外,汾渭平原龙山时代早期遗存的年代上限普遍集中于公元前2700年左右,进一步佐证了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年代上限。

延安芦山峁、横山红梁和靖边庙梁遗址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典型聚落,高精度测年范围集中在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2200年(图2),由于三处遗址均为典型的晚段遗存,因此其年代下限具有参考性。古城东关和襄汾陶寺遗址是晋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典型聚落,其中晚段遗址的年代下限集中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与陕北地区高精度测年数据基本吻合,因此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的年代下限可定为公元前2200年。

龙山时代晚期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非常丰富。从考古学文化因素看,除了南部地区的文化面貌模糊以外,整个区域普遍流行以双鬲、单把鬲、甗、盂、三足瓮等为代表的稳定器物组合,并强势冲击和影响到了晋中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形成了以石峁文化为核心的聚合格局,河套地区也首次实现了区域内部的文化整合,达到了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陕北地区本阶段的测年数据非常丰富。寨砦梁、庙盘、圆纹磨和上阳洼遗址均为早段遗存,年代上限集中于公元前2200年,并且与晋西地区兴县碧村遗址小玉梁地点的年代数据基本吻合,年代上限具有参考性。以宽弧档双鬲、圜底瓮、直壁缸和喇叭口平底瓶等为代表的器物组合与龙山时代早期遗存的衔接非常明显,由于陕北地区龙山早期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2200年,并且得到了周边区域年代数据的佐证,因此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年代上限可定为公元前2200年。

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年代下限一直存在争议,观点包括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和公元前1800年。石峁、新华、火石梁、木柱柱梁和神圪塔梁遗址均为近年来开展的高精度测年,年代下限集中于公元前1700年,由于六处遗址均包含典型的晚段遗存,因此年代下限具有参考性。值得注意的是,吴小红等近年在石峁遗址开展了一系列高精度测年,将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的年代范围定为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年代上限与本文结论吻合,年代下限则有所延长。由于相关数据并未发表,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是从陕北地区相关遗存的年代数据看,公元前1700年应该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普遍的年代下限。传统上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伴随着龙山时代的落幕而逐步兴起,这种现象在晋南、关中、豫西等区域普遍可见,但是陕北地区石峁文化在公元前1750年并未湮灭,而是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共同存在于北方地区,这个结论对于思考石峁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历史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通过对陕北地区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可以初步重建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仰韶时代晚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700年,龙山时代早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00年,龙山时代晚期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700年。

需要注意的是,陕北地区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年代序列也存在差异。受限于田野考古工作的不足,区域性编年框架尚难以全面建立,但是通过核心遗址的年代学审视,建构关键节点的时空坐标,对于探索陕北乃至河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具有促进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5YJC78000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博”项目(2025QBG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新石器时代房址复原研究综述

杨子怡

考古发掘将立体的遗址转化为可记录的二维资料,这些资料经过想象、解释、阐释又被还原为三维的信息,再使用描述、绘图、摄影、视频、重建等方法展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视化模型也成为表现遗址的重要方法。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新石器时代房屋复原研究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在方法论与表现形式上的演进。

早期房址复原多以文字描述和考古绘图为主。1963年,《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考古报告中,便已对半坡遗址发现的几座经典半穴居的方形房子、地面上木架建筑的方形和圆形房子进行了复原,并且研究了柱洞、灶坑、墙壁等部分的建造过程与技术。1975年,杨勋勋从建筑学的角度对仰韶文化有代表性的住房遗址进行了系统性的复原推测,绘制多幅房址复原图,并使用类型学的方法探讨了各期房址的演变规律。

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复原的维度。张孝光从屋盖、门洞、门道等方面对陇东镇原原山遗址的房址进行了复原。钱公麟复原了龙南遗址多处房址,并绘图。梁星影对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的居住形式做了初步的复原研究。江道元对西藏卡若文化房址进行了复原设想。董学增、钟晓青、杜金鹏、程晓钟等学者也分别对西团山文化、大地湾遗址、古城寨大型建筑等展开复原探讨。

近年来,房屋复原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张登毅对坪头遗址窑洞式建筑F1建造过程进行了复原。王伟林等根据发掘资料复原出河遗址大型房屋F1、F2、F3的营造过程及废弃过程。国庆华等尝试复原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 的形状、高度和大门位置。孙周勇等以寨砦梁遗址材料为基础,尝试复原龙山时代以窑洞为主体建筑的前后室房址的建造过程和使用情况。李文杰提出创建“红烧土建筑考古学”,并以关山庙遗址F22为例,详述复原推导过程。岳岩敏、白雪华、马晓、马萧林、孟越、李俨等学者分别对西坡、贾湖、梁王城、庙底沟、滕花落、两城镇等遗址房址展开建筑技术与形制的复原研究。

在学位论文方面,王雨佳、刘云秀、杜萌、王天艺、李娜、高震宇等青年学者聚焦不同区域与类型的房址,系统梳理并复原了新石器时代陕北、东北地区、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及牡丹江流域的典型房屋遗迹,推动了区域性房址研究的深化。综上所述,以文字和图像为表达方式的房址复原通过讨论发掘残存的柱洞、基槽、墙壁、白灰面等遗迹现象,结合民族志与建筑学的知识,以文字描述与绘图的方式呈现复原成果。尽管这种方法较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与经验推演,缺乏可验证的标准化过程,静态的绘图和文字也限制了对建筑动态立体空间的想象和体验,但其在房址结构理解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这种形式的房屋复原成为公布发掘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回顾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房址复原研究,已从文字和二维绘图的推演走向多学科发展阶段,并已扩展到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展示和公众教育等多个层面。尤其是在公众考古领域,房屋作为人类最基本、最熟悉的生活空间,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与联想,无论是实物的复原还是虚拟体验,都有助于将考古学的科学性、知识性与公众的可感性、参与性结合在一起,起到科学普及、激发文化认同和保护意识的作。

然而,当前研究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复原过程的透明度和科学性问题、理论反思的相对滞后、不同方法之间的衔接等。房址复原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操作,更是一种理解过去生活的思维方式。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完善和跨学科合作的深入,这一研究将在塑造对早期人类和文化的认知图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 平潭综合实验区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发掘将立体的遗址转化为可记录的二维资料,这些资料经过想象、解释、阐释又被还原为三维的信息,再使用描述、绘图、摄影、视频、重建等方法展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视化模型也成为表现遗址的重要方法。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新石器时代房屋复原研究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在方法论与表现形式上的演进。

文字、绘图复原研究

早期房址复原多以文字描述和考古绘图为主。1963年,《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考古报告中,便已对半坡遗址发现的几座经典半穴居的方形房子、地面上木架建筑的方形和圆形房子进行了复原,并且研究了柱洞、灶坑、墙壁等部分的建造过程与技术。1975年,杨勋勋从建筑学的角度对仰韶文化有代表性的住房遗址进行了系统性的复原推测,绘制多幅房址复原图,并使用类型学的方法探讨了各期房址的演变规律。

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复原的维度。张孝光从屋盖、门洞、门道等方面对陇东镇原原山遗址的房址进行了复原。钱公麟复原了龙南遗址多处房址,并绘图。梁星影对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的居住形式做了初步的复原研究。江道元对西藏卡若文化房址进行了复原设想。董学增、钟晓青、杜金鹏、程晓钟等学者也分别对西团山文化、大地湾遗址、古城寨大型建筑等展开复原探讨。

近年来,房屋复原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张登毅对坪头遗址窑洞式建筑F1建造过程进行了复原。王伟林等根据发掘资料复原出河遗址大型房屋F1、F2、F3的营造过程及废弃过程。国庆华等尝试复原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 的形状、高度和大门位置。孙周勇等以寨砦梁遗址材料为基础,尝试复原龙山时代以窑洞为主体建筑的前后室房址的建造过程和使用情况。李文杰提出创建“红烧土建筑考古学”,并以关山庙遗址F22为例,详述复原推导过程。岳岩敏、白雪华、马晓、马萧林、孟越、李俨等学者分别对西坡、贾湖、梁王城、庙底沟、滕花落、两城镇等遗址房址展开建筑技术与形制的复原研究。

在学位论文方面,王雨佳、刘云秀、杜萌、王天艺、李娜、高震宇等青年学者聚焦不同区域与类型的房址,系统梳理并复原了新石器时代陕北、东北地区、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及牡丹江流域的典型房屋遗迹,推动了区域性房址研究的深化。

综上所述,以文字和图像为表达方式的房址复原通过讨论发掘残存的柱洞、基槽、墙壁、白灰面等遗迹现象,结合民族志与建筑学的知识,以文字描述与绘图的方式呈现复原成果。尽管这种方法较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与经验推演,缺乏可验证的标准化过程,静态的绘图和文字也限制了对建筑动态立体空间的想象和体验,但其在房址结构理解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目前这种形式的房屋复原成为公布发掘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复原实验研究

复原实验研究,即通过实体重建来验证房址复原方案的可行性,是房址研究从理论推导向实践验证迈进的关键一步。它不仅包括按推测方案重建房屋实体,也涵盖对建筑材料、工具、工艺的模拟实验。

半坡遗址博物馆曾两次进行半坡房屋的重建。第一次重建时,以半坡房屋遗迹F37、F24、F6为重建对象,第二次重建的房屋和步聚均与前次相同,增加了开解板材和F39的重建。周阳生对新乐遗址博物馆史前建筑的复原拟定了《遗址复原工程一期工程设计基本纲要》,并详细介绍复原步骤与原则。2017年7月,北京大学在长岛北庄遗址附近进行了史前建筑搭建实验,基本完成F16主体结构 的复原建造。通过实验对半穴式房屋上部分的房屋结构、屋顶形式、墙体构造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对房屋的空间与使用有了更直观的体验。另外,我国关于建筑材料如红烧土墙、白灰面、板瓦等的实验考古案例诸多,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展示了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复合陶瓦屋顶的拼接技术。肖娟英等采用材质科技分析与模拟实验手段,对巩义双槐树仰韶房址地坪制作原料和工艺进行了研究等。

国内专门进行新石器时代房屋复原的研究性论文仅北京大学《山东烟台北庄遗址F16房屋原搭建实验考古报告》一篇,但遗址博物馆的房屋复原展示在我国常见,大多并未作为实验考古研究来记录,而是当成博物馆展示的一种方法或者考古研学互动的一项内容。

实验考古能有效检验复原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揭示单纯分析过程无法考虑到的实际情况,如工具的适用性、建造时长和人力组织等。相比之下,国内博物馆复原项目的建造流程大多没有按照实验考古的方法进行记录和分析研究,对房屋的“生命史”研究仍有不足。

数字化重建研究

21世纪以来,关于考古学中结合GIS使用3D数据和可视化的局限性和潜力已得到广泛的讨论,但直至2008年,三维技术在遗址内部GIS中的优势得到实证确认时,考古学界才广泛接纳三维可视化技术。近年来,这种技术进一步发展,其不仅是一种可视化展现重建的方法,更使得探索基于非线性叙事、三维视角和虚拟重建的考古学意义建构新途径成为可能。如R.P.Barrat使用Google Sketchup创建贾恩谢莱姆路(Chajnsielem)小屋的3D模型时,先行进行原位要素的重建,随后对不确定的因素进行合理的猜测实验,最终选择合适方案复原。“虚拟重建恰塔霍裕克项目”(Virtually Rebuilding Catalhöyük Project)初始工作阶段制作了三座恰塔尔霍克克建筑的虚拟重建模型,其更侧重教育与公众传播的移动设备数字考古路径,这些模型具有实时交互特性,并免费公开。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遗址的房屋重建项目则使用了混合媒体的表现方法,制作了实验性影片,表现3D技术更具体验性的一面等。

我国同样在20世纪初期开始探索3D技术在考古文物方面的应用。在新石器时代房屋重建的研究中,何晓庆对临潼姜寨遗址进行了三维可视化系统设计。陆良虎进一步再现了姜寨聚落,实现了场景中的人机交互操作。国庆华等用3D摄影测量技术收集遗址资料,用参数化设计程序进行石峁皇城台门址分析和数据整理。陈盼盼基于遗址形态参数复原的三维模型构建办法,实现了对东赵遗址房屋等人文景观的等比例、原位置虚拟复原与三维重建,为文化景观演化提供数据支持。北京大学建筑考古专业师生对新石器时代大型木构建筑鸡叫城F63进行了复原研究,最终形成了四种建筑复原方案,并以方案一制作建筑生成动画。

同时,数字化重建也是我国博物馆展示的一种重要和普遍的方式。如西安半坡博物馆借助VR技术,受众可进入史前半坡村落的虚拟重建场景中。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运用全息投影展现房基遗存,还设置一台可触控的数字化演示设备,着重演示“木骨整塑”陶房的建造过程。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对史前遗址的东部进行复原,按照新石器时期原始民众的风俗习惯、居住址的特点等,以仿真效果设计出原始场景和生活场景。

数字化房屋复原技术不仅提升了考古研究的精确性和可视化程度,也为公众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更好的工具。目前我国的研究已在技术层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多数数字化成果侧重于视觉呈现,缺乏对考古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模型构建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往往被完美的视觉效果所掩盖。

结语

回顾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房址复原研究,已从文字和二维绘图的推演走向多学科发展阶段,并已扩展到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展示和公众教育等多个层面。尤其是在公众考古领域,房屋作为人类最基本、最熟悉的生活空间,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与联想,无论是实物的复原还是虚拟体验,都有助于将考古学的科学性、知识性与公众的可感性、参与性结合在一起,起到科学普及、激发文化认同和保护意识的作。

然而,当前研究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复原过程的透明度和科学性问题、理论反思的相对滞后、不同方法之间的衔接等。房址复原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操作,更是一种理解过去生活的思维方式。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完善和跨学科合作的深入,这一研究将在塑造对早期人类和文化的认知图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